1870—1931年东北移民运动主要阶段与语言融合

梁　红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　要：清朝末年至九一八事变前，大量国内外移民涌入我国东北地区，主要包括关内移民、朝鲜移民、俄国移民和日本移民，引起东北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在东北历史与中国移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主要对此时期东北移民运动的阶段分异与语言融合进行研究。移民运动历经了从关内移民主导到殖民扩张，再到多元竞争三个阶段。通过比较每个阶段不同移民群体在迁入时间、人员构成、迁移数量、移民动机上的差异，可以剖析出移民运动具有以下特点：移民数量多、规模大，迁移具有自发性与阶段性，群体分布区域与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重叠，移民动机与相关政策存在两极分化，近代交通设施的完善显著提升了人口迁移速度。在长期的语言接触过程中，移民群体的语言与土著语言相互融合，具体表现为汉语成为区域通用语，同时留有满语成分，外省方言与俄语、日语、朝鲜语等外来词也在东北官话中留下痕迹。在此基础上可深入探究影响语言融合进程的关键因素：移民群体的人口数量与文化影响力、迁入时序与居住模式、群体间的互动频率以及不同群体的语言态度。本研究对于深刻理解东北区域社会演变、文化发展和语言生态复杂性，服务当下东北振兴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东北地区；移民运动主要阶段；语言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东北地区北邻俄罗斯，与日本隔海相望，东南与朝鲜接壤，因其丰饶的资源和独特的地缘位置，成为近代列强在远东争夺的战略焦点，与东亚国际格局的走向密切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关内移民、朝鲜移民、俄国移民和日本移民涌入东北地区，对东北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移民在该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对近代东北移民运动与语言融合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入理解区域发展历程、社会变迁和各民族文化融合，还可以揭示语言融合的规律与机制，理解语言是如何塑造区域共同体意识的，更能深刻理解今日东北独特的多元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形成根源，为当代东北发展提供深刻启示。

在对具体问题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作出明确界定。东北地区的含义，旧时主要指中国东北部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四盟和河北省承德市，现今通常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所在区域，人们为称呼方便合称为东北，因位于我国的东北部而得名。古时也称东北地区为辽东、辽海、盛京、东三省或简称东省。史学家金毓黻通过考证，指出东北地区的一些异名现已不适用，而用“东北”一词来称呼东北地区就很恰当，可以不受时代迁移的影响，同时也指出用“满洲”称呼东北地区是极无根据的①。关于何为移民，研究者的释义有所不同，这里采用葛剑雄的定义，即移民是指“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②。这里研究的时间跨度是1870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移民群体以关内移民、俄国移民、日本移民和朝鲜移民四个移民群体为主。

关于近代东北地区的移民运动，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予以关注。梳理国内外对东北移民的既有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多侧重单一群体，如关内移民、日本移民等，缺乏多国移民群体的比较视角。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移民研究较多，而对关内移民最为关注，且在研究关内移民时多集中于移民政策、迁徙原因及其对东北社会变迁的宏观影响等方面。基于此，本文从多国移民群体比较视角切入，结合地方志、报刊

作者简介：梁红（1978–），女，汉族，黑龙江佳木斯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东北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

①当时内蒙古东部和承德归属热河省，即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热河四个省。下文将东北地区简称为东北。金毓黻考证认为用“满洲”称呼东北地区是无历史依据的，详见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第1–12页。

②参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3页；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 导论大事年表，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等多源史料开展互证研究，探究不同移民群体的阶段性演变如何影响语言融合。

二、1870—1931年东北移民运动的主要阶段及特点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九一八事变前，大量国内外移民迁往我国东北边疆地区。国内移民即关内移民，因从内地进入东北一般要通过山海关，故有此称呼。关内移民主要为关内汉族移民，国外移民以朝鲜移民、俄国移民和日本移民为主。根据人口迁徙情况，大致可以将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870—1904）：关内移民主导、俄日势力渗透与朝鲜边民越境

东北地区气候严寒、地处边陲，历史上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旷人稀。明清战争导致汉民内迁，土地荒芜，清军入关后东北人口进一步减少，社会经济凋敝。为恢复经济，清廷初时在东北地区推行招垦汉民政策，但该政策推行未久，又于康熙七年（1668）改为实行封禁政策。清廷视东北为“龙兴之地”与政权退路，为维持满洲风俗与掌控力，修筑“柳条边”限制汉民流入。清政府实施了近两百年的封禁政策，严重阻碍了东北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变化。

通过不同移民群体的对比发现，关内移民是最早迁入东北的，也是移民运动的主导群体。1860年，内外交困的清廷在东北部分地区实行招民放垦政策，关内移民开始大量迁往东北。据赵中孚《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东三省移民》记载，东三省的人口数量，在1864年为2187286人，1884年为4737000人，1895年为3024000人，到1898年为5413000人[①]。小越平隆的《满洲旅行记》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迁移场面。这些移民来源地以山东、河北等北方省份为主，在东北以务农、做工为业。因东北在山海关以东，这种大量迁徙运动也被称为“闯关东”。由以上数据可知，1884—1898年东三省人口猛增，表明关内移民正加速涌入东北，中间虽有顿挫，但1898年又迅速增至540余万人，甚至超过人口未下降前的1884年很多。可能是因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与清廷移民政策的调整，加之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招募大量劳工，双重拉力之下吸引大批关内移民涌入，而1895年人口数下降，可能是受中日甲午战争影响。根据推拉理论，迁出地的推力对移民人口增长具有关键作用。清代后期，北方数省频发的自然灾害、兵燹匪患，加之中原地区特别是山东、直隶两省的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共同形成了关内民众向东北迁徙的主要推力。至1903年，中东铁路的通车又加速了关内移民的运动。

这一阶段的朝鲜移民主要为边民越境流入。清代厉行东北封禁时期，朝鲜北部边民就曾“犯禁”潜入我国长白山地区，彼时朝鲜北部的咸镜道等地自然条件恶劣、赋税沉重，且居民深受地域歧视，生存艰难，在国内流动受限的情况下，北部居民只得越境进入东北。朝鲜移民大批迁入是在19世纪60—70年代，当时朝鲜北部连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加之国内强权政治横行，社会极度混乱，民不聊生，朝鲜居民为生存而向东北迁移，多聚居在图们江以北地区。据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附节录光绪十六年总理衙门奏稿”载，光绪七年（1881）朝鲜流民占垦吉林边地，光绪十六年（1890），“现在朝鲜茂山府对岸迤东之光霁峪、六道沟、十八崴子等地方，韩民越垦约有数千，地约数万晌（垧）”[②]。又据《延吉边务报告》“延吉厅建设之沿革”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吉林将军“立社编甲升科”，图们江北岸“越垦韩民”已有20899人[③]。数据显示，朝鲜移民增长迅速，由数千人增至2万余人，可能还与19世纪后期列强对朝鲜的侵略加剧有关。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起义出兵，甲午战争后虽受沙俄掣肘，但基本控制了朝鲜。另外，中东铁路建设产生的用工需求也吸引了大量朝鲜劳工涌入。

同时，沙俄推行“远东政策”，积极向外扩张，鸦片战争又昭示了清朝的衰弱，于是俄国势力开始向中国东北渗透，俄国移民逐渐迁入东北。“逐次把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强行占据，并有窥视黑龙江以南腹地的企图……俄国的船只和武装移民，自一八五〇年代初叶起，进入黑龙江、乌苏里江，甚至松花江，在三姓登陆。”[④]19世纪80年代，俄国人常越境至我国东北采金。1896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沙俄趁势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及《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等，由此全面攫取了中东铁路的路权及沿线各项特权。随着1898年中省铁路（全称为中国东方铁路，亦称东清铁路）全面开工与俄国移民政策的激励，东北的俄

①赵中孚：《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东三省移民》，《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
②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③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④赵中孚：《近代东三省移民问题之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4年第4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国移民与日俱增。鲍里斯·罗曼诺夫在《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中指出,1900年在中东铁路界内居住的俄国移民达6000人[①]。据《黑龙江省志·外事志》载,至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时,黑龙江地区的俄人总数已超过3万人[②];《美国领事报告》亦指出,1903年底东北俄人数量已超过3万人[③]。修路期间俄人移民以铁路员工、警察和商人等为主,多在中东铁路沿线聚集。"自一八九七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以来,俄国方面有每年移民六十万至满洲的计划。"[④]由以上数据可知,该计划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俄人数量可观且移民目的基本达成,即将东北变为事实上的殖民地,以进行资源掠夺。

日本移民迁入东北较晚。在这一阶段,日本已确立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移民活动是其政策的具体实践。甲午战争前进入东北的日本移民很少,主要为军官、右翼团体人员、商人等,旨在为军事侵略东北提供情报支持,并为后续的大规模移民创造条件。据统计,甲午战争前"进入营口的日本人有40人左右"[⑤]。之后日本以营口为据点,逐步向东北地区渗透,如在营口设领事馆,开辟国内直达营口的航线,为日本移民迁徙提供便利。甲午战争后,东北的日本移民渐多,至1903年3月,在东北(主要是东北南部)的日本人有1556人[⑥]。

(二)第二阶段(1905—1914):关内移民潮、殖民扩张与朝鲜移民增长

随着社会剧烈变革,这一时期关内移民大潮涌入东北,日本侵略势力增强,日俄双重殖民格局形成,朝鲜移民也加速迁移。

经过甲午、日俄战争,我国东北边疆危机更为严峻,当时舆论提倡移民实边。为防备外国侵略势力,清廷彻底放弃封禁东北,在光绪三十年(1904)实行全面开放招垦政策,加之1903年中东铁路、1904年胶济铁路先后通车,关内移民前往东北更便捷,移民运动开始加速发展。到1907年,东三省人口已突增至14457087人[⑦],与1898年相比增加了三倍。人口的急剧增长可能还与1907年东北改制,精确了人口统计有关。之前史料记载的关内移民数量可能不包括八旗人口和边疆部族,这里仅为参考。1912年清朝解体、民国政府成立,中国社会剧变。相关资料指出:"民国成立以后,灾害也是连年不断。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12—1937)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单说各种较大的灾害,就有77次之多……而且各种灾害,大都是同时并发。"[⑧]大批关内难民流亡东北。他们主要来自华北地区,部分来自中原各地,谋生方式以务农、受雇及小本经营为主,并呈现出由南向北的分布态势。民国政府延续清末移民政策,同时推出多项鼓励举措,加之关内人口压力等因素,最终形成关内人口迁往东北的热潮。据民国元年(1912)的统计,东三省的人口为19742000余人[⑨]。数据显示,五年间增加近53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余万人,表明光宣之际东三省人口在激增。

俄国势力在日俄战争后退守北满,黑龙江地区俄人移民数量显著增长,呈现向俄国势力范围内集中迁徙的态势。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1907年远东的俄国移民共10万有余[⑩]。而据《美国领事报告》记载,1907年俄人移植黑龙江左岸者约有8万人,1908年增达16万人[⑪]。数据表明,黑龙江左岸俄人移民数量增加了一倍,应与俄人移民快速集中有关。哈尔滨因是中东铁路枢纽站,自然成为俄国移民聚居的中心。这说明俄人移民在东北分布的变化,与其势力范围的收缩密切相关。据《远东报》统计,"1911年黑龙江区域计有俄人73635人"[⑫]。这一阶段俄国移民以商人为主。

①鲍里斯·罗曼诺夫著,陶文钊、李金秋、姚宝珠译:《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9页。
②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第69卷《外事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③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8页。
④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1928年第3期。
⑤李淑娟、王希亮:《从染指渗透到聚积强势——以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
⑥B. 阿瓦林著,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1页。
⑦赵中孚:《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东三省移民》,《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
⑧葛剑雄主编,安介生、张根福、陈鹏飞著:《中国移民史》第七卷(上)《清末至20世纪末》,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
⑨赵中孚:《近代东三省移民问题之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4年第4期。
⑩《论俄人殖民东亚》,《外交报》1907年7月15日,第23版。
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8页。
⑫《东清铁路线内各国人民数目》,《远东报》1911年6月7日,第2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通过日俄战争，日本获取了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并控制了南满铁路，进而与俄国形成南北分据之势，共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为进一步扩大侵略势力，同时也为防范俄国报复，加速推进向东北移民，致使该地区日本移民数量显著增长，他们主要聚居在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附属地。据关东局调查统计，1906年"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日本移民有16612人，1910年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有76341人①。李淑娟等学者指出，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居住的日本移民，1913年为77663人，1914年为82185人②。1914年后，日本政府尝试向东北农业移民，并相继建立移民村，然而该尝试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多数日本移民还是以从商为主。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力增强，在双重势力压迫下流入东北的朝鲜移民显著增加。据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韩民越垦之始末》记载，"今日（1907）延吉境内韩民至有五万余户，华民转不及其四分之一"③。清政府解除封禁后，迁入东北的朝鲜移民数量持续增长，据《延吉全境华韩人民户口调查表》的统计，至光绪末年，延吉地区"华民数65561名，韩民数78825名"④。由数据可知，朝鲜移民数量已超过当地居民数量。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后，建立了以宪兵为核心的殖民统治体系，引发朝鲜民众的持续抵抗。1910—1914年，各地武装起义被镇压，大量爱国志士、反日群众及破产农民被迫迁入中国东北，继续开展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为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渗透，积极推动本国人口迁徙，但因东北地方政府多次颁布如"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等训令而受阻，日本遂采用"日人移鲜，鲜人移满"的间接移民策略，向东北输送人口，推进其殖民目标。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数量迅速增加。据《间岛在鲜人状态调查书》记载，1909年6月延边地区的"朝鲜垦民"为78158人，1910年6月为98137人，1911年为118004人⑤。1911年与1909年相比，延边的朝鲜移民增加了39846人。又据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间岛事情》载，1914年间岛朝鲜人口为178000人，与1910年间岛109500人相比⑥，四年间增加了近7万人。显然，社会动荡易导致朝鲜移民数量的快速波动，而被强制迁徙的朝鲜移民，已沦为日本殖民侵略的工具。在这一阶段，朝鲜移民多分布于图们江和鸭绿江以北，只有少数朝鲜人再迁至奉天地区和北满等地。

（三）第三阶段（1915—1931）：多元移民群体竞争加剧

这一阶段，东北的关内、俄国、日本和朝鲜移民数量均持续增长，出于不同动机的多元移民群体的竞争加剧。

1915年之后，中国社会极度动荡，如日本的加紧威逼、帝制复辟、北洋军阀连年混战，东北的关内移民数量迅速增长。据日方统计，到1915年东三省人口增至20110100人⑦，比1907年增加了560余万人。东北人口增长如此之多之快，不可能是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迁入的可能性大，当时报纸（如《盛京时报》等）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东北的关内移民人数显著上升。据赵中孚《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东三省移民》记载，迁入东三省的关内移民人数，1921年为208940人，1922年为350000人，1923年为341368人，1924年为384730人，到1925年增长至472978人，到1926年增长至566725人。特别是1927年至1929年，大规模的关内移民潮涌入东北，如1927年迁入的关内移民为1050828人，1928年为1089000人，1929年为1046291人，而到1930年迁入的关内移民数量降至673000人⑧，1930年时东三省总人口为2995万人⑨。关内移民主要分布于东北北部，即吉林、黑龙江地区，从事的职业多样但多数为接受雇佣，如雇农、卖苦力、小贩等。

由以上数据可知，1922—1926年，每年迁入的关内移民为30～50万人，1927—1929年每年迁入100余万人，1930年关内移民人数上升势头有所回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河北、山东、河南、山西

①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②李淑娟、王希亮：《从染指渗透到聚积强势——以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
③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④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⑤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2页。
⑥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8页。
⑦赵中孚：《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东三省移民》，《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
⑧赵中孚：《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东三省移民》，《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
⑨赵中孚：《近代东三省移民问题之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4年第4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等华北诸省频繁发生各种严重灾荒，尤以山东、河北两省最为严重，人口大批流亡；同时，兵祸和匪祸横行，民生多艰。为谋求生存，关内移民大批迁往东北，以山东人和河北人占多数。1927 年之后，东三省关内移民人数激增。1930 年关内移民迁入人数下降，估计与当时紧张的政治氛围有关，但移民运动仍在持续。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北地区，禁止内地移民进入东北，人口迁徙才被迫中止。虽资料来源不同，人口数量也有出入，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到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人口约为 3000 万人，赵中孚等学者认为迁入的关内移民超过 1500 万人，可以看出关内移民的规模之大。他们的迁入，对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东北地域特点与东北方言的形成都与关内移民息息相关。

随着 1914 年 6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俄国移民被征入伍，1915 年 10 月 8 日《盛京时报》报道，“中东铁路租界内侨居俄民甚夥，自欧战发生后，迭次征召预备兵，现已居民无多。日前俄政府又来电召集第十三次征兵，由中东路商工征集兵额一万三千人，经驻哈俄领事商同霍尔瓦特总裁，除在职人员无可征募外，已征兵七八千人，由西伯利亚陆续运送阵地以资防御云”①，东北的俄国移民开始减少。以哈尔滨为例，1912 年哈尔滨俄人移民为 43091 人，而 1916 年为 34115 人②，与一战爆发前的 1912 年相比减少 8976 人。总之，一战期间东北的俄国移民数量不断下降，很多俄商歇业，俄人店铺房屋转让，一战对俄人移民的商业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大批沙俄旧政权成员涌入中国东北，俄人移民数量快速增加。据 1917 年 9 月 20 日《远东报》记载，中东铁路沿线俄人移民有 47868 人③。据《中华周报》载，1918 年远东白俄人数达 20 万人④。学者 B. 阿瓦林在《帝国主义在满洲》一书中指出，1918 年北满的俄人约有 18 万人⑤。1922 年黑龙江省俄国移民在 20 万人以上⑥。据《铁路协会会报》记载，至 1923 年中东铁路沿线的俄人移民已达 100 万户⑦，这与十月革命前的 47868 人相比数量猛增。以哈尔滨为例，1916 年哈尔滨的俄人移民为 34115 人，1918 年为 60200 人，1920 年为 131073 人，1922 年为 155402 人⑧。到 1923 年，“侨居哈尔滨的俄国人一度多达 20 万人，甚至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人数。哈尔滨成为中国最大的俄侨聚居中心”⑨。以上数据表明，1916—1923 年哈尔滨的俄人移民数量增加了近 5 倍，十月革命后俄人移民的增长十分突出。这时期俄人移民主要聚居在长春以北至黑龙江地区，多为需要救济的难民，境遇已大不如前。

到 1923 年 3 月，中国收回了中东铁路沿线的主权，东北俄人移民数量明显下降。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益稳固，1924 年中东铁路实行中苏共管后，无国籍的俄国移民因而失业，生活日益艰难，很多俄国移民离开东北，部分人加入苏联国籍回俄国，部分人或迁居国内其他区域或迁往国外，东北的俄国移民又开始逐渐减少。例如，哈尔滨俄人移民 1925 年为 92852 人，到 1931 年降至 68805 人⑩，与 1923 年的 20 万人相比减少了 3 成。整个东北地区的俄人移民数量快速下降，据《东北年鉴》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的俄国移民有 188980 人⑪。

俄国十月革命后，东北的日本侵略势力增长，日本移民数量也随之迅速增加。据资料记载，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1915 年为 101565 人，1920 年为 160060 人⑫。学者薛琪薪指出，1924 年东北日本移民有 179484 人⑬。据关东局调查，1925 年东北日本移民为 187988 人⑭；而彭家元《中国边地之现状与移民》

①《俄又征兵回国》，《盛京时报》1915 年 10 月 8 日，第 7 版。
②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2 页。
③《调查中东路沿线外人确数》，《远东报》1917 年 9 月 20 日，第 3 版。
④谦：《远东的白系俄人》，《中华周报》1932 年第 36 期。
⑤ B. 阿瓦林著，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80 页。
⑥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第 69 卷《外事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1 页。
⑦新申：《中东路线俄人之状况》，《铁路协会会报》1923 年第 124–126 期。
⑧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2 页。
⑨石方：《黑龙江移民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52 页。
⑩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2 页。
⑪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东北年鉴》，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 1931 年版，第 363 页。
⑫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 页。
⑬薛琪薪：《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江汉学术》2019 年第 6 期。
⑭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文指出，1925年东北日本移民有20余万人[①]。据前满铁社长大仓（Okura）调查，1928年日人在满洲的总数为22万人[②]。安介生认为，到1930年底东北日本移民的人数为22.5万人[③]，据日本关东局调查统计，东北日本人总数为233749人[④]。截至九一八事变前，关于东北日本移民的数量，李淑娟、王希亮和石方等均认为有24万人[⑤]；安介生等学者看法相近，但对日本人的具体数量未明确，提出有20余万人[⑥]。随着东北的俄国侵略势力式微，日本移民才进入长春以北地区，多从事商贸、服务行业，也有少数日本人务农。值得注意的是，自1915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日本在东北地区地位的逐渐巩固，日本移民大批涌入东北。一方面，因一战期间俄国忙于欧洲战场且国内社会矛盾突出，导致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式微，日俄合作瓜分东北的时代结束；另一方面，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将旅顺、大连租借地租借期延长至99年，日本已视东北为“新领土”。加之20世纪20年代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掠夺东北资源转移国内矛盾，日本多方激励本国人民迁往我国东北，企图实质上永远占据东北。

1916年与1917年朝鲜南部遭遇罕见自然灾害，又因1919年“反日民族独立运动”失败，导致朝鲜移民大批向东北迁徙。据《间岛日本总领事馆文书》载，1916年间岛的朝鲜人为203426人，1919年为279150人，1921年为307806人[⑦]。由数据可知，间岛的朝鲜人五年间增加10万余人，尤其是1919年增加迅速，与1916年相比增加了7万多人。此后，朝鲜民众仍持续流迁东北，直到日本战败，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载，至九一八事变前在满洲居住的朝鲜人有80万人[⑧]。这些朝鲜移民与我国人民共同开发东北边疆，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朝鲜族，为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注入了持续活力。

综上，这一时期东北移民运动的特点：一是移民数量多、规模大。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移民数量相当庞大，最突出的是东北的3000万人之数。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迁移东北移民潮达到高峰，被人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⑨]。移民群体中关内移民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以山东、河北人居多，尤其是山东籍人。每个阶段中关内移民的数量均为最多。“至宣统三年（1911），东北人口已增加到1841万人，其中由鲁、冀、豫三省移入的人口可达1000万人，山东人最多，占70%～80%。”[⑩]原因可能是山东、河北等省频发严重灾荒并邻近东北。受灾区域与迁入地的距离和受灾程度均会影响移民的来源、数量、迁徙规模等，正如英国统计学家E. G. Ravenstein提出的移民法则所言，迁移人口数量与迁移距离成反比[⑪]。二是自发性与阶段性。各移民群体基本为自发迁移；朝鲜移民有过曲折，前期为自发，后期“自发＋强制”混合。各阶段特点明显，从关内移民主导到殖民扩张，再到多元移民群体竞争。三是移民群体分布区域与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重叠。俄国势力在北满，俄国移民也多集中于黑龙江及中东铁路沿线地区；日本控制南满，日本移民也多聚居在南满铁路沿线及关东州地区；朝鲜移民主要分布在邻近中朝边境的延边、通化地区；关内移民则因是国内人口而遍布东北，具体是从辽宁向吉林、黑龙江推进，类似于地理位置的分布。四是移民动机、政策的两极分化。关内移民、朝鲜移民主要是生存动机驱动，俄、日移民则是殖民动机驱动。用人口学的推拉理论来解释，关内移民的推力是灾荒与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朝鲜移民的推力是生存压力与日本政策裹挟，俄、日移民的推力是帝国扩张与资源掠夺，外来移民的拉力均为东北地区各种丰富资

①彭家元：《中国边地之现状与移民》，《东方杂志》1925年第6期。

②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1928年第12期。

③葛剑雄主编，安介生、张根福、陈鹏飞著：《中国移民史》第七卷（上）《清末至20世纪末》，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36页。

④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⑤李淑娟、王希亮：《从染指渗透到聚积强势——以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石方：《黑龙江移民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11页。

⑥葛剑雄主编，安介生、张根福、陈鹏飞著：《中国移民史》第七卷（上）《清末至二十世纪末》，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36页。

⑦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8页。

⑧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⑨葛剑雄主编，安介生、张根福、陈鹏飞著：《中国移民史》第七卷（上）《清末至20世纪末》，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页。

⑩范立君：《东北移民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⑪E. G. Ravenstein,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3, no.2, 1889,p.287.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源的吸引。俄国政府对俄国移民有免税政策、中东铁路附属地的特权，服务于军事经济控制。日本是满铁移民引导政策，服务于“大陆政策”。朝鲜移民受日本“鲜人移满”政策控制。中国政府对关内移民的政策是内外交困形势下的被动应对，如清后期的部分开禁到全面开禁，以及民国时的“移民实边”政策。五是交通设施完善显著提升了迁移速度。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交通的便利加速了东北移民运动。

总之，移民动机与政策性质决定了近代东北移民运动的历史作用，即国内移民充实东北边疆人口并巩固边疆、推动区域整合，殖民移民引发冲突，被迫移民加剧社会脆弱性。九一八事变前的移民格局，实为东北亚国际势力博弈与中国内部人口流动交织的结果，这是理解近代东北复杂性的关键。

三、国内外移民语言与东北当地语言融合

学者葛剑雄认为，“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①]。1870—1931 年东北移民运动期间，在国内外移民大量迁入东北的同时，他们所负载的语言文化也进行了空间移动。国内外移民与东北当地居民以及其他各地移民，在长期交流过程中语言接触日益频繁，逐渐相互影响，已经出现语言相互融合的趋势。下面剖析语言融合的具体表现，进而深入探究影响这一融合过程的关键因素。

（一）语言融合的具体表现

外来移民与东北土著及各地移民之间的语言融合，主要表现为汉语的主体地位与各民族语言在东北官话中的痕迹。

第一，满语衰落与汉语中满语等少数民族词语的遗留。东北地区历来是多民族交错杂居之地，由此形成了多元并存、复杂多样的语言面貌，有满、蒙、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语，以及幽燕方言等多种语言。近代大移民运动之前，由于满族群体为东北土著，且是东北人口主体，又因满族在清朝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及清政府的大力提倡，满语作为官方语言成为东北地区的通用语。随着近代关内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关内汉族移民成为东北的多数群体，使得东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实际上融为一体。由于汉族移民数量巨大和迁入时间集中，再加上当地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古代幽燕方言和阿尔泰化的“汉儿言语”），汉语影响了东北原住民的语言。在长期与汉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东北土著使用语言时感觉词语匮乏，于是大量地借用汉语词汇，逐渐学习汉语，摒弃本民族的一些词语，满语渐渐被汉语融合替代，通用语言逐渐向汉语转变，满文满语逐渐被放弃。据黄维翰在《呼兰府志》中记载：“旗官档案，自乾隆初至咸丰末年皆用清文，汉军官庄丁虽操汉语而文字仍用满洲，公牍作汉文者鲜能通其音训。同治以后，清、汉文具有之。光绪中叶，语言文字俱从汉俗。近日满洲人能通清文者不过百分之一，能操清语者则千人中一二而已。”[②]民国以来，满人大都改说汉语，尚能说满语、识满文的满人已经极少了。资料表明，光绪以后东北使用满语的人越来越少，满语逐渐走向衰落。但东北满语的衰落有一定地域差异，先是辽宁，然后是吉林，最后是黑龙江，这与移民迁入有直接关系：移民开发早的地区如辽宁省，满语衰落就快；移民开发晚的如黑龙江省，满语衰落就慢。

日常交际中的语言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汉语在影响东北原住民语言的同时，也受到东北原住民语言的影响。随着关内移民与东北原住民不断交流，汉语也吸收了音译过来的满语等土著语的词汇，有些词语东北方言至今还在广泛使用，如啰唆（不利落）、秃噜（不守信用）、邋遢（不整洁、不利落）等词就来自满语，老嘎达（排行最小的）、把式（专门精通某种技术的人）等词来自蒙古语。现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地名就是由满语演变而来，如依兰（满语“依兰哈喇”，意思是三姓，依兰过去被称为三姓）、牡丹江（满语“穆丹乌拉”）、吉林（满语“吉林乌拉”）、珲春（土名“浑蠢”，满语意思为边地）、阿城（土名“阿什河”，满语“阿勒楚喀”）、宁安（土名“宁古塔”，宁古塔的满语意思为“六”）、虎林（土名“呢玛河”，“呢玛”的满语意思为山羊）、绥化（满语“绥楞阁阿林”）、富锦（土名“富克锦”，满语“富替新”）、巴彦（满语“巴彦苏苏”）、勃利（满语“博和里”）、七台河（满语“奇塔毕拉”）、绥芬河（满语“绥芬”）等。汉语的主体地位与满语留下的深刻印记，共同记录了历史上民族迁徙背景下移民语言与土著语言之间深度的交融与演变。

第二，山东、河北方言在东北官话中的烙印。由前文可知，关内汉族移民数量巨大，且以山东、河北籍

①葛剑雄主编，安介生、张根福、陈鹏飞著：《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大事年表》，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2 页。
②石方：《黑龙江移民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34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人为主，山东移民占绝大部分，河北人次之，这些山东、河北移民的到来，使山东方言、河北方言在东北官话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东北官话“安”“熬”等字，不少地区都读成[n]声母，少数地区读成[ŋ]声母，这点与冀鲁官话相同。东北官话“客”字读为[tɕhiɛ]，“色”字读为[sɛ]，这与冀鲁官话的读音趋于一致。锦州方言中的“捐”“全”“宣”与“专”“传”“栓”同音，将[tɕ]类声母混为[tʂ]类声母，这是冀鲁官话一些地区的典型特点①。东北官话“街”字读[kai]，现在山东不少地方就将其读为[kai]。再有东北官话“卵”“暖”二字读为[lan][nan]，韵母没有介音[u]，这就是山东、河北等地方言的印记。

东北官话中很多词汇来自山东方言，如客（客人）、小小子（小男孩）、各应（讨厌）、多暂（什么时候）、肉头（食物柔软；呆傻）、家雀儿（麻雀）、二五眼（能力差）、犟眼子（倔强、固执）、刺挠（痒）、瘫巴（瘫痪）、一担挑儿（姐妹的丈夫的关系，相当于连襟）等。东北官话中还有部分来自河北方言的词语，如晌午（中午）、蔫巴（不精神）、背旮旯（阴凉地）、糊糊（玉米粥）、骨堆儿（放在一起）②。山东方言对辽宁方言、吉林方言的影响较大，学者陶娥、邹德文等人均有论述。需要说明的是，东北官话除受山东、河北方言影响外，还有中原官话的痕迹，但因体量较小，影响不显著，这里仅对有代表性的山东、河北方言进行分析。

第三，俄、日、朝等外来词在东北官话中的借用。东北的国外移民数量虽然远少于国内移民，但随着近代俄、日、朝等国外移民的迁入，东北居民使用的汉语与俄语、日语、朝鲜语等外来语不断地接触碰撞，东北官话也先后融合了俄语、日语、朝鲜语等外来语的成分。

在与俄罗斯人的交往中，东北官话吸收了不少俄语外来词，有些至今还在使用，如里道斯（Литовская колбаса，蒜味红肠）、列巴（хлеб，面包）、格瓦斯（квас，一种用面包渣发酵酿制的饮料）、伏特加（водка，烈酒）、喂得罗（ведро，大口水桶）、马申（машина，汽车；缝纫机）、戈兰（кран，水管的开关）、布拉吉（платье，连衣裙）、瓦罐（вагон，车厢）、笆篱子（监狱，俄语“полиция”的转义）、哈拉少（хорошо，好）等。俄国移民主要在东北北部的黑龙江地区活动，因此哈尔滨地区受俄语影响较大，融入的俄语外来词比较多，但近年来有些俄语外来词已经消失，如现在已不称连衣裙为“布拉吉”，仍称为“连衣裙”。

日本移民使用的日语以及朝鲜移民使用的朝鲜语，也在与当地百姓的语言接触中对东北官话产生了影响。东北官话也吸收了一些日语外来词，如马葫芦（マンホール，指下水道的检修孔）、榻榻米（たたみ，铺在床板上的草垫子等）、打八扣（たばこ，意思为烟草）、晚霞子（ワイシャツ，意思是衬衫）、果子（お菓子，意思是点心、糕点）等。日本在殖民霸权下搞语言同化，试图强行推广日语为东北地区通用语，但收效甚微。东北官话吸收日语外来词并不多，随着历史的推移，东北方言中的大部分日语外来词已经消失。东北官话还从朝鲜语中借用了部分词语，如金达莱（진달래，花名）、叽个浪（왁자지껄，乱吵吵；吵嘴）、阿玛妮（아마니，妈妈）、阿爸吉（아버지，爸爸）、啊依咕（아이구，哎呀）、甘沙咪哒（감사합니다，谢谢）等。但朝鲜移民因双重身份对东北语言文化的影响有限。

综上，移民的大量涌入促进了东北地区的语言接触与融合，其结果是形成了汉语占主导地位，同时吸收多种语言成分的东北官话体系。

（二）影响语言融合进程的关键因素。

语言融合进程中的影响因素不少，下面着重分析其中一些关键因素：人口数量和文化影响力，移民群体的迁入时序、居住模式、互动频率，人口群体的语言态度等。

第一，人口数量和文化影响力。某一群体在人口与文化层面的显著优势，是推动该区域语言接触与融合进程的主要驱动力。从移民运动三个阶段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移民群体的人口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关内移民、俄国移民、朝鲜移民、日本移民；第二阶段移民群体中关内移民的人口数量最多，其次是朝鲜移民，俄、日移民人口数量相当，位于最后；第三阶段依旧是关内移民的人口数量最多，其次是朝鲜移民，再次是日本移民，最后是俄国移民。纵观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关内汉族移民不仅在不同移民群体中占绝对多数，且在东北原住民中也为多数群体。东北地区3000万汉族的人口绝对优势，使得汉族人口群体的语言成为语言融合的主体语言。同时，源远流长的中原汉族优秀文化也对语言融合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关内移民带来的先进农耕技术、商业技术和生活方式，对东北原住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很大

①杨春宇：《东北官话历史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76页。

②李平：《从东北方言词汇看多元文化》，《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年第25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影响，也推动原住民群体主动去学习关内移民使用的汉语，使汉语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社会交流的优势语言与通用语言。俄日两国文化虽然也是先进文化，但与中华文化的历史、文化差异大而导致隔阂，在文化影响上不占优势。总之，某一群体的人口数量和文化影响力在语言融合中很重要。

第二，移民群体的迁入时序、居住模式与互动频率。移民群体的迁入时序与居住模式，是影响其语言习得进程的关键变量。通过移民群体对比可知，这一时期关内移民是最早涌入东北地区并构成其早期移民社会基础的群体，迁入后即与当地人杂居，与土著长期接触达60余年，日常互动高频化，二者语言接触场景广泛，覆盖了邻里聊天、子女玩伴、家庭互助、教育学习等方面，使得汉语与满语等语言加速融合。之后朝鲜移民迁入我国东北，再后俄国移民迁入，最后日本移民迁入，这些国外移民群体均各自集中居住[如哈尔滨的“埠头区（道里）”“新城区（南岗）”等俄国侨民社区，大连的“文化街的小洋楼（八七疗养院院内）”“南山街”等日侨社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的众多朝鲜族社区等]，以各自内部语言互动为主，但需要与外部土著群体、其他移民群体进行经济、公共服务互动，形成“内部母语+外部通用语（汉语）”的双轨模式，因此融合速度较慢，但保留了各自母语的特色。

此外，人口群体间互动频率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语言趋同进程。在东北地区，关内移民与土著互动频率最高，其他群体互动频率低。在这一时期的移民活动中，关内移民与土著的互动关系平等，与俄、日、朝鲜移民的互动关系不平等或不完全平等，俄、日移民与土著以及其他移民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平等，存在权力差异。对等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形成以需求为核心的互动模式，从而提升互动频率。俄、日移民因殖民霸权地位，互动时更易基于权力压迫，因此与其他人口群体间的互动就少，导致语言融合受阻。而朝鲜移民是跨国求生，非原生群体，社会地位与国内人口相比略有不如，但又在经济生活中与中国人民相互需要，互动时更多是出于需求。在移民运动的前两个阶段，俄、日移民虽地位平等，但因敌对意识而互动少。至第三阶段，因日本侵略势力一家独大，导致权力压迫下的俄日互动也少。因此，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往往能够促进更高频的互动，加速语言融合进程。需要说明的是，除互动关系的平等性以外，互动频率也受移民迁入时序、居住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人口群体的语言态度。人口群体对语言接触所持的态度，是决定语言融合程度的关键变量。积极的态度通常会促进深层次的语言同化，而消极的态度则往往导致融合过程停留在浅表层面。在1870—1931年东北移民运动期间，不同人口群体因移民动机、文化背景和历史处境差异，对语言融合的态度呈现明显分化。

关内汉族移民秉持着积极、开放和务实的态度，主动地学习并融入东北主流语言环境，是融合的主体，因其移民动机是求生与开拓，而语言是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工具，还因关内汉族移民中山东、河北人居多，他们使用的冀鲁官话与东北原有的汉语方言（幽燕方言、“汉儿言语”）音系相近，学习成本低。东北土著（满族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疏离到被动融合的过程。因清后期满语衰落，汉文化占据绝对优势，随着“闯关东”汉族移民潮水般涌入，满族原有的文化语言空间被急剧压缩。但东北土著与关内移民地域认同一致，且同为中华文化圈的成员，与其他移民群体相比，满语和汉语要融合得更深一些。

俄、日移民均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和殖民者心态，他们均将母语视为身份象征，认为中朝两国语言落后，对语言融合态度消极，倾向于建立语言隔离区，但二者也存在一定差异。俄国移民主要在中东铁路沿线建立了自己的社区，通过社区的教堂、学校等传承俄语，与当地中国人的语言交流多局限于商业、劳务等必要层面，是“自上而下”的有限输出。在移民运动的不同阶段，俄国移民心态还发生了变化，从殖民者的上位心态转变为逃难者的寄人篱下心态。随着日本殖民野心的膨胀，日本移民的语言行为更具侵略性，其在“南满铁路附属地”等地，推行日语为“高级语言”，旨在同化中国人而非与之平等融合，他们学习汉语多是出于管理和控制的需要。朝鲜移民则在坚守与适应之间徘徊，态度具有双重性，既有强烈的民族语言坚守意识，又有学习汉语的现实需求，他们多因贫困和日本殖民压迫迁入东北，聚居形成朝鲜族村落，内部严格使用朝鲜语以保持文化认同。总之，人口群体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的语言自发融合，才更容易深入，强制是无效的。

总结这一时期东北地区语言融合的总体特征：它并非平等的交流，而是在中国人口占绝对多数的背景下，以汉语东北官话为“底床”进行的。关内移民是主动的塑造者，土著居民是被动的贡献者，俄日移民是居高临下的输出者（俄国移民有过曲折），而朝鲜移民则是谨慎的参与者。这种复杂的语言生态，正是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社会变迁、国际势力角逐和文化碰撞的生动缩影。

四、结语

文章对关内移民、朝鲜移民、俄国移民、日本移民等群体进行了比较，通过阶段性演变的差异，揭示了不同移民群体在不同阶段，根据自身需要和社会条件，与主流语言之间的一种动态而复杂的互动。研究表明，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语言融合，以及移民群体与土著群体之间的语言融合，并非简单的线性同化，而是一个从陌生隔阂到选择性融入，再到跨文化构建的阶段性跃迁。这修正了传统同化论的单向视角，揭示了移民群体作为能动主体，其群体数量、文化影响力、居住模式、互动平等与否、语言态度等，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了语言融合的轨迹、速度与最终形态。

本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语言融合的阶段性演变会清晰地投射在语言景观的变迁上。从早期移民社区单一母语的封闭式标识，到后来双语混杂的店铺招牌，再到当下多语融合的创意符号，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本身就是记录不同移民群体动态融合过程的原始史料。此项研究对现实社会亦有一定启示，当代社会的移民类型很多，其中国家主导的移民亦有不少。例如，我国的水库移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态移民等。在制定语言政策时，政府应适应移民群体的需求，精准支持。对移入区域而言，地方政府需正确理解移民群体内部的语言多样性，采取相应举措，促进更深层次的融合而非表面同化。

回顾整个研究过程，移民人口数据的精确统计是难点，原因在于当时政府未对人口统计给予足够重视，且移民运动自发性强，不同资料记载不一，同时史料直接记载有限。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每一次移民潮均与社会动荡有关，除战争外，灾荒也是社会动荡的直接诱因或催化剂。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灾荒频发，这反映了当时我国人口分布不均导致的环境超载现象严重。虽然东北地区环境承载力强、自然资源丰富，但在近代却经历了外国势力的掠夺性开发，导致部分生态环境遭受了不可逆的损害。这一历史教训警示世人，在推进区域发展时，必须将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置于核心位置。

当前东北地区面临的核心挑战已发生历史转变，从人口迁入变为人口净流出。2010—2020年，东北三省净流出人口增加了135.15万人[①]。劳动年龄人口持续流失，再叠加低生育率，明显制约了经济发展，而经济滞后又加剧人口外流，形成恶性循环，可能影响边境稳定与社会繁荣。从近代移民历程看，经济社会因素始终主导人口流动。东北地区经济的衰退导致就业机会不足，而产业振兴仍是根本，应围绕现代农业、冰雪经济、清洁能源等优势领域，打造产业链集群。优化营商环境，消除“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负面印象，强力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从而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岗位。宜居生活是基础，打造最先进的智慧供暖、恒温节能住宅和大规模室内活动空间，变气候劣势为特色。集中资源建好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中心城市，提升城市品质和文化底蕴，重塑城市吸引力。同时，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周边中小城镇，提供差异化生活选择。文化认同是纽带，针对东北大量外流人才，通过情感招商、文化交流，让在外人员为家乡引智、引资。

当前东北居民外流，虽然与历史上关内移民的生存型迁徙不同，但本质上仍受经济与社会动力驱动。因此，推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关键，而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扭转人口外流的不利局面。针对稀缺人才，地方政府应给予政策激励，降低生活成本，如提供安家补贴、人才公寓、教育补贴等，吸引人才留下。为实现这一目标，要以史为鉴，通过系统政策增强人口吸纳能力，实施科学人才战略，培育本地高端人才并引进外来优质人才，形成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需提高社保统筹层次与服务水准，改善居民生活，切实提升幸福指数，从而增强本地的吸引力。

①马胜春：《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人口研究》2022年第6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